

阿尔及利亚战争^{*} 前后的法国种族主义

——以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社会地位的变化为例

张庆海

内容提要 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是法国历史上针对阿尔及利亚移民(以下简称“阿移民”)的种族歧视达到极端的时期。法国政府和法国种族主义者对阿移民先后采取了侮辱性宣传、行为限制乃至屠杀的政策;法国公众则从与阿移民和睦相处发展到对其悲惨处境持冷漠态度,有人甚至在“十月大屠杀”时成为法国种族主义者的帮凶,只有极少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平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从总体上来看,在二战结束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内,阿移民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其生活条件不断恶化。而上述变化均与阿尔及利亚战争及法国政局的动荡息息相关。

关键词 种族主义 阿尔及利亚移民 十月大屠杀 殖民主义

自全球殖民化以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双向移民活动即已开始。一般来说,宗主国向殖民地的移民多为殖民者,他们与殖民政府任命的殖民地官员一道,成为殖民地的统治阶层,拥有诸多特权;而殖民地 toward 宗主国的移民则纯属廉价劳动力输出,他们在宗主国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遭受着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各殖民帝国的衰落,各宗主国的种族歧视有所淡化,殖民地移民在宗主国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二战后宗主国的种族主义沉渣泛起,殖民地移民在宗主国的处境再度恶化。就法国而言,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海外最大、最重要的殖民地,双方的移民活动在19世纪时即已开始。二战后,双方的移民活动掀起了一个高潮:1949年,阿尔及利亚向法国的移民数为83377人,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移民总数为194800人;而欧洲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总数更是高达100万人,其中多数是法国人。阿移民的处境在二战后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但自1947年以后,法国种族主义者有关阿移民的恶意宣传和对移民区的“清洁”运动又使其境况出现逆转,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深入更成为种族主义者发动“十月大屠杀”的借口。有关这一时期阿移民在法国的境况,国内学者至今尚无专文论述,而西方学者尤其是英、法学者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或文化优越感

* 指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

参见L. Muracciole, *L'Émigration Algérienne*, Paris, 1950, p. 30.

参见沈坚:《当代法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而有意无意地为种族主义开脱。因此,有必要对二战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种族主义者对阿移民的歧视与屠杀行为作一探讨,以期从另一角度解读二战后法国的政治史,并给至今仍然存在着的法国种族主义倾向以警醒。

一、种族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移民的侮辱与骚扰

二战后,阿移民尚能与法国公众和睦相处(至少是和平相处),但自 1947 年底至 1956 年,法国警察的所谓“清洁”运动及法国种族主义者的蓄意侮辱性宣传导致阿移民的处境再度恶化。此时的种族主义者主要是法国新闻界的右翼势力和在阿尔及利亚当过警察的法国人,他们从各自的“阵地”向阿移民发起挑衅,由此引发了法国各界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和恶劣的种族歧视行为,造成了阿移民生活环境的艰苦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在当代一些西方史家的著作中清晰而明确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种族主义行径。

法国警务部门和内政部是法国种族主义的主要发源地,1945—1962 年乃至此后几乎每一次带有暴力倾向的种族冲突,都有法国警务部门或内政部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二战后初期,法国政府曾宣布阿移民乃至阿尔及利亚本土的阿尔及利亚人都具有与法国公民平等的权利,法国民众与阿移民尚能和睦相处,但法国警务部门却顽固地歧视阿移民。1947—1948 年,巴黎警察局向公众反复宣布北非人的“高犯罪率”,并声称北非移民应对“巴黎 40% 的夜间袭击事件负责”。以此为根据,自 1947 年起巴黎警方开始定期对阿移民居住区采取搜查行动。法国警察当时尚不敢公开地无故抓捕阿移民,他们只是以惩治“犯罪行为”为借口,说罪犯就藏在阿移民区内,而他们对阿移民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与种族无关。但后来巴黎警方针对阿移民区的特殊搜查几乎已成定例,1953 年 7 月 14 日甚至发生了法国警察枪杀 6 名阿移民的恶性事件,这就使得巴黎警方的种族歧视昭然若揭。1955 年 7 月 30 日发生的法国警察联合搜查行动是法国警察骚扰阿移民区的典型事例,法国警察包围并搜查了著名的“阿拉伯人区”。法国内政部长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是,该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逮捕数百名盗贼、赌徒、为妓女拉皮条的人、扒手、窝赃者及行凶抢劫者,从而使伊斯兰教徒区‘清洁’(cleaning)”。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所抓捕的阿移民中仅有马迪(Mohamed Maadi)一人被起诉,理由是他偷过一件衬衫,而且巴黎法院后来判定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而将其释放。此次行动遭到阿移民的强烈反抗,大约有 2000 名阿移民参与了由此次搜查所引发的与警察的流血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法国警察的无理搜查行动更是变本加厉。1955 年 9 月 6 日,巴黎警方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极大的“清洁”阿移民区的行动,结果有 30000 名阿移民被宣布受管制、300 名阿移民被捕。此后,巴黎警察的搜查频率大大提高,仅在 1956 年就分别于 3 月 9—12 日、3 月 30—31 日、4 月 1—4 日、5 月 1 日发生过 4 次搜查行动。外省警察仿照巴黎警察的先例也多次搜查本地的阿移民区。法

如英国的内尔·麦克马斯特(Neil MacMaster)在其所著的《殖民地移民与种族主义,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1900—1962》(*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一书中尽管竭力鞭挞种族主义(主要是极端种族主义),但却有意无意地认为,正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暗杀等手段导致法国民众对其在法国的移民怀有冷漠和仇恨的情绪,却绝口不提法国种族主义者的诱导所起的作用和更深层的原因。具有类似种族主义倾向的西方史家很多,尤为明显的是保罗·约翰逊[参见(英)保罗·约翰逊著、李建波等译:《现代——从 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07—619 页。该文主要通过分析、评述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状况的恶化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指出麦克马斯特等人的观点中所隐含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

关于法国警察所谓的“清洁”运动的具体资料请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New York, 1997, pp. 191 - 192。

国警察的种族主义行动在 1960—1962 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960 年 9 月 5 日,法国警察逮捕了 6 名阿移民并将其送上了军事法庭,理由是他们“企图颠覆法国现政权”;在 1961 年 10 月 17—18 日的大屠杀中,法国警察是直接而主要的施暴人。尽管法国内政部和警方一再强调警察的“清洁”行动的目的只是抓捕罪犯,但不论是阿移民还是法国社会各界都十分清楚,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将阿移民区恶意地宣布为“破坏性场所”,阿移民则是“凶残”、“恐怖”的人群。法国内政部和警务部门的种族主义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在巴黎及外省警察连续骚扰阿移民之时,法国右翼报刊与警察的行动相配合,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阿移民的“犯罪问题”,企图将阿移民描绘成“野蛮”、“凶残”的人群,以达到挑拨阿移民与法国公众之间关系的目的。1948 年 11 月 5 日,法国右翼报纸《震旦报》(*L'Aurore*)用头版头条报道说,“在巴黎的 1/4 地区,阿拉伯人是夜晚的国王”。此类不实报道在法国的大小报刊上屡见不鲜,有些报刊甚至故意歪曲事实真相,将一些具体的恶性犯罪行为强加到阿移民身上,其种族歧视倾向十分明显。如 1955 年 12 月一个名叫马蒂内(Martine)的小女孩在巴尼奥勒(Bagnoles)郊区失踪,当地的一份晚报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即用头条报道说,“小马蒂内被一个北非人绑架”。更为可耻的是,该报于第二天又在报纸的夹缝刊发了一条短讯,说此女孩是被已与其父分手的母亲带走的,却只字未提该报前一天对北非人的大肆诬蔑。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阿尔及利亚一方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自由派的报纸《世界报》(*Le Monde*)亦于 1949 年 9 月 16 日用三个专栏宣传北非人的“犯罪率问题”,并下结论说北非人的“犯罪行为”已成为法国的“国家问题”。法国新闻媒体有意丑化阿移民的倾向相当突出,且持续时间很长。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这种倾向有加强的趋势,如 1973 年发生两次阿移民与法国人的冲突事件,法国新闻媒体再次丑化阿移民;1973 年初,法国各地发生了多起袭击和暗杀阿移民的事件,导致 52 名阿移民被杀,大批阿移民受伤,但法国新闻报刊却只字未提;1973 年 8 月 25 日,一个名叫爱米尔·古尔拉克(Emile Guerlache)的法国人在工厂被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阿移民萨拉·布格里尼(Salah Bougrine)杀死,法国新闻媒体立即借此大肆宣扬阿移民的“残暴”,弄得几乎所有法国人都知道此事,但却几乎无人知道布格里尼是精神病患者,结果煽动了法国普通民众对阿移民的疯狂报复,30 多起恶性事件随之发生,仅在马赛就有 15 名阿移民被惨杀。甚至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当 1983 年再次发生阿移民与法国人的冲突,1988 年 10 月阿尔及利亚国内纷争、惨杀之时,法国报刊同样进行不公正的报道。“灰暗”、“恐怖”、“野蛮”和“落后”等形容词成为新闻媒体在 20 世纪中后期介绍阿移民时的代名词。可

参见 Martin Evans, *The Memory of Resistance: French Opposition to the Algerian War (1954 - 1962)*, Oxford, 1997, Preface. 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的著作是他采访了上百位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主要包括法国人、阿尔及利亚移民等)后汇集的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法国警察无故骚扰、歧视阿移民的事实。

A. Michel, *Les Travailleurs Algériens en France*, Paris, 1956, p. 156.

《世界报》在 1945—1962 年间刊登了大量的反种族主义的文章,批判法国各界的种族主义行为,在马丁·埃文斯采访过的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阿移民和法国人)中,很多人明确指出他们就是通过阅读《世界报》而了解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参加解放阵线的(参见 Martin Evans, *The Memory of Resistance: French Opposition to the Algerian War (1954 - 1962)*, pp. 78, 94, 115)。1957 年,《世界报》发表文章说,“种族主义已经成为法国社会最大的威胁,法国人在不同时期更换不同的种族歧视对象”(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8)。但就是这样一份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的报纸,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也曾不实地报道了阿移民的“丑恶”。由此可知当时法国媒体恶意宣传“阿移民丑恶”的严重程度和不可信程度。

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 191。由于在法国的北非移民中阿移民占绝大多数,因此法国报刊此时所提及的北非阿拉伯人实际上就是指阿移民。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75。

以说,对于阿移民与法国人关系的恶化,法国新闻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是仅次于警务部门和内政部的极端种族主义的发源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表现出比警务部门更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

由于法国种族主义者的敌视性宣传,尤其是警察的无端骚扰,使得阿移民无法正常生活而被迫成群结队地涌向郊区或城市中的“阿拉伯”街区,他们开始集体生活,以抵抗来自外部的法国社会各界的压力。

二、阿移民与法国社会的隔绝及法国政府的住房安置计划

自阿移民进入法国以来,他们在各地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居住区(一般统称为阿拉伯人居住区),当然也有的阿移民散居于法国人社区之中。

二战后初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取消了对阿尔及利亚人进入法国的种种限制,阿尔及利亚人可以随时进入法国并享有法国公民的待遇,于是大批阿尔及利亚人举家离开家乡迁往法国各地。但二战后法国经济恢复速度很慢且一波三折、多次反复,阿移民多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很低,无法购置房产。举家移民的浪潮而导致的对住房的迫切需要更加重了阿移民的住房危机,他们不得不集体涌向郊区的空地,在那里建简易住房。随着 1954 年 11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尤其是 1956 年以后,法国的种族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歧视、虐待阿移民,迫使其不得不逃向郊区。1954—1958 年,阿移民在法国各城市的郊区建立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新居住区,形成了与法国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国中之国”。这些居住区的情况是阿移民处境的真实写照,它们有三大特征:其一,生活基础设施奇缺,阿移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居住区内的住宅基本上是棚屋,火灾隐患极大;没有自来水、电,也没有排放污水的设施,阿移民的生活用水要到城区或郊区的河流中汲取;居住区内的道路长年被污泥覆盖。其二,阿移民居住的棚区与法国社会隔绝。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就地理位置而言,阿移民居住的棚区一般建在极少有法国人住的偏僻地方,四周大多有铁路线、工厂或高压电网将之隔离在法国人居住区之外,有的阿移民妇女甚至几年都没有走出棚区一步;就其与外界的交往而言,棚区附近的公共设施如医院等也将阿移民与法国人作了区分;就棚区的社会组织结构而言,阿移民居住的棚区几乎就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故乡的翻版。阿移民大都是整村地迁移到法国的,他们到达法国后仍然住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管理者,过着故乡式的生活,法国政府和警务部门根本无法深入阿移民居住的棚区进行管理,事实上也少有法国人愿意进入肮脏的棚区。可以说,一个阿移民棚区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其三,棚区居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如南特(Nantes)郊区的阿移民棚区在 1955 年时有 4300 名阿移民,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增至 6600 人。

法国种族主义者将阿移民赶向棚区,恶化了阿移民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加深了阿移民对种族主义者的仇恨。1954—1956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与

关于阿移民居住区生活条件的艰苦及居住区的规模,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 191.

参见 A. Tristan, *Le silence du fleuve*, Bezons, 1990, pp. 14 - 23. 该书中附有大量的棚区生活照片,可供参考。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p. 64 - 65. 吉罗在一次对医生和护士的采访中发现,他们都表示出对阿移民的憎恶,认为阿移民到医院看病都是装病,是想享受公费医疗,因而经常遭到他们的拒绝、敷衍。

“民族独立运动”(Mouvement nationale algérien)争夺对法国阿移民的领导权,阿移民大多坚定地站在激进的“民族解放阵线”一边。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阿移民捐献给“民族解放阵线”4亿新法郎,有力地支援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民族解放阵线”将棚区改造成独立于法国社会之外的“飞地”(enclave),使之成为对抗阿国内温和派及法国殖民者的有效阵地,阿移民坚决地执行“民族解放阵线”的命令。

从上文可知,正是法国的种族主义者将阿移民赶向棚区,并使之最终投向“民族解放阵线”的怀抱。

为了打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活动,法国政府和法国种族主义者将矛头对准了阿移民。根据麦克马斯特的叙述,法国政府为了瓦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阿移民棚区的阵地,至少从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其一,法国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动国家住宅计划。此项计划以给予阿移民市区住宅为主要手段,逐步消灭阿移民的棚区。这种做法本来可以在客观上改善阿移民的生活环境,但法国政府的目的其实不在此。法国政府先以“阿移民尚未适应法国的生活方式”为借口,将阿移民集中到预设的营地进行所谓的“现代生活”培训。而负责对阿移民进行培训和管理的人员大多是法国的前军官或曾在阿尔及利亚当过殖民官员的法国人。此项计划的第二步是将阿移民安置在市区的住宅,但第二步计划在1964年以前几乎没有真正实现过。结果,阿移民的处境虽有些许改善,但期望得到住宅的阿移民却被置于法国政府的监督之下。法国政府控制阿移民的企图一直没有减弱,即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政府和警务部门仍然对阿移民持怀疑态度。20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曾准备提供1亿法郎作为“阿移民回国的经费”,但此项计划如同50—60年代的住房安置计划一样,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成了一个笑话。其二,建立专门对付阿移民的警察和情报机构。1958年3月,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被任命为巴黎警务长官,以加强对阿移民的控制。两年后,他因使用铁的手腕对阿移民进行管理而“声名鹊起”。此外,法国政府还建立了“法国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教徒技术援助署”(Service d'assistance technique aux français musulmans d'Algérie),它向阿移民提供福利、工作为幌子,专门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一个“专门的情报局”。至“1961年3月,它共收集了近30000份有关阿移民的资料,并为政府确定了356个‘可疑之处’或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中心”。它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全部被送往法国警务部门,为警察控制阿移民提供线索。但是,法国种族主义者的行动和法国政府的控制行为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对阿移民的住宅安置计划成为空口许诺,引起了阿移民的不满;而收集到的情报也基本上是假情报。至1960年末,法国种族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警察是无法介入到阿移民区的”。而阿移民区作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阵地,其作用越来越得到加强:1957年阿移民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策划下,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工;

参见 B. Stora, *Its Venainent d'Algérie, L'Immigration Algérienne en France, 1912 - 1992*, Fayard, 1992, p. 169; Martin Evans, *The Memory of Resistance: French Opposition to the Algerian War (1954 - 1962)*, Preface. 埃文斯认为“民族解放阵线”在阿移民区建立了良好的税收制度,对每个阿移民的税收数额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学生每月交500旧法郎,工人每月交3000旧法郎,商店等业主每月交5000旧法郎。

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p. 193 - 199.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13.

帕庞是二战后法国以残酷著称的种族主义者。1981年,他因镇压阿移民而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谴责。1996年,他因曾在1942—1944年间抓捕大量犹太人并将被捕者送到波尔多的纳粹集中营而受到起诉。

B. Stora, *Its Venainent d'Algérie, L'Immigration Algérienne en France, 1912 - 1992*, p. 351.

1961年10月又是在其策划下,阿移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

三、“十月大屠杀”的悲剧

法国种族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屡遭失败。当时戴高乐政府正致力于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种族主义者阴谋颠覆戴高乐政府的叛乱也被镇压。同时,法国种族主义者在法国国内介入阿移民区的企图未能得逞,这使他们愈加恼恨。他们对前途普遍感到绝望。为此,他们组织了“秘密军组织”,对阿移民进行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秘密军组织”在“1961年5月法阿埃维昂谈判开始后的一年中,在阿尔及利亚以各种方式杀害穆斯林平民约1.2万名,打死打伤警察、宪兵和保安队员数百名;在本土制造爆炸案1000多起。埃维昂市长布朗被炸死,文化部长马尔罗差点饮弹毙命。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法国种族主义者(此时他们与殖民主义者几乎属于同一类人)在对主张和平的人士进行暗杀(如他们策划了4次对戴高乐的暗杀,但未成功)以及在阿尔及利亚疯狂屠杀无辜平民的同时,也将仇恨发泄在阿移民身上,并于1961—1962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极端行动,其中尤以“十月大屠杀”最为典型,这段时间是法国种族主义极端化时期。帕庞在法国内政部长罗歇·费里(Roger Frey)的授意下,于1961年9月1日向巴黎警察许诺说,他本人及警务部门将“遮盖”所有针对阿移民的暴力行为。此后,帕庞又给予普通警察“自由行动”的全权。10月6日,又是在罗歇·费里的支持下,帕庞下令关闭所有阿移民的公共场所(如咖啡馆等),并实行了针对阿移民的宵禁令,自晚8:30至次日早晨5:30禁止阿移民在巴黎市区和郊区的大街上通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则针锋相对地组织阿移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在南特、圣丹尼斯等地都发生了此类示威活动,其中以巴黎的示威规模最大,且发生了残酷的流血冲突,史称“十月大屠杀”。1961年10月17日晚6—11时,大约有40000多名阿移民从棚区汇集巴黎市中心,抗议帕庞的宵禁令。在帕庞的授意下,巴黎的警察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镇压阿移民的抗议活动。警察用警棍、木棒、枪托殴打阿移民,甚至开枪射击,残酷地镇压阿移民。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1961年10月17—18日的巴黎冲突中,有11538名阿移民被捕、2名阿移民死亡。吉罗认为官方的这一数字显然不可靠,因为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仍然记得1961年10月18日早晨塞纳河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90。

张锡昌、周剑刚:《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p. 51 - 52。另见 J. - L. Einaudi, *Le Bataille de Paris*, Seuil, 1991, pp. 83 - 84。关于内政部长罗歇·费里是否直接下令屠杀阿移民的问题,现史学界尚有争议。从“十月大屠杀”的规模、持续时间及事后处理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费里应该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即使他没有直接下令屠杀,至少帕庞也是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默许的,否则调动全国各地警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内政部事先没有得到信息,但屠杀在内政部的所在地巴黎持续时间达2天,内政部不会不知道。而内政部没有采取任何解决措施,帕庞在事后也没有得到处罚,也说明其主管部门内政部的袒护。

关于参加示威的阿移民的人数,史家们的记载并不统一,40000人是麦克马斯特著作中的数字,规模较大。吉罗(Jelloun)著作中的数字为30000人(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 200。另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51)。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51。

漂浮着无数死尸的惨状。据麦克马斯特记述,有数十名阿移民被警察打伤后,又被捆住手脚丢入塞纳河中;还有 50 名阿移民被抓入巴黎警察局大院,后来也被帕庞下令丢入塞纳河中。据估计,此次屠杀中约有 200 名阿移民丧生,被打伤的阿移民不计其数。埃文斯也估计在此次事件中有 200 名阿移民死亡。为抗议种族屠杀,阿移民在法国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结果同样遭到警察的镇压,在科龙贝(Colombey)有 2 名阿移民被杀,421 人被捕。事实上,这场屠杀早在 1960 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各地的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而且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 1962 年以后。极端种族主义在法国泛滥成灾。

“十月大屠杀”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行将结束之前,此时的戴高乐政府已经镇压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者的反叛,稳定了法国的政局,并有计划地开始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戴高乐政府此举得到世界进步人士的赞同。然而,“十月大屠杀”并非与戴高乐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戴高乐政府对巴黎警察的屠杀行动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罗歇·费里和帕庞在事后并未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任何处罚,帕庞甚至“继续担任巴黎警察局长一职直到 1967 年,此后还担任了瑟堡的议员”。1996 年帕庞虽被控而受审,但他受审的原因不是他曾经屠杀阿移民,而是他在 1942—1944 年参与屠杀犹太人。从这一点来看,对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进步性总体上不应评价过高,因为戴高乐政府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完全是出于法国的利益,它不具备起码的人道主义和种族平等的原则。

四、法国民众对阿尔及利亚移民态度的转变

一般来说,法国普通民众的种族主义意识并不突出,他们在 1945—1962 年间虽然没有阻止种族主义的蔓延,但他们在早期大体上尚能与阿移民和平共处,流血冲突并不多见。但是,由于种族主义者的长期宣传,法国民众对阿移民的态度经历了从和平相处到对之恐惧和憎恶的过程。

1945—1954 年是法国民众与阿移民和平相处的时期。二战后,阿尔及利亚向法国移民出现了新的特征,即不仅移民总数大为增加,而且不再是单纯的青壮年男子移民,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随之一同移居法国。麦克马斯特的估计较为乐观,他认为法国民众接受了阿移民的存在。一份对战后马赛 101 个阿移民家庭的调查显示,“阿移民与其欧洲邻居关系甚好”;法国民众对阿移民的孩子的怜悯和爱护尤其体现了这种和睦关系,“法国的母亲们开始时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到衣衫褴褛的阿移民孩子的暴力袭击,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们于是送一些半新的衣衫给这些阿移民的子女”;阿移民妇女祖里卡(M. Zoulika)则说,“我们周围的法国人很喜欢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姑且不论这些阿移民的回忆是否片面,但当时法国民众对阿移民的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51。

关于“十月大屠杀”的过程及惨状,可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p. 199 - 201。

参见 Martin Evans, *The Memory of Resistance: French Opposition to the Algerian War (1954 - 1962)*, Abbreviations。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51。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 201。

关于二战后初期阿移民与法国民众的关系,参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p. 190 - 192。

确没有表现出 1961 年“十月大屠杀”时的冷漠。吉罗认为,阿移民与法国人“处于既相互尊重又相互隔离的复杂状况之下,其间夹杂着带有不信任和抱怨的偶尔的接触”,他们之间有些许敌意。笔者认为,吉罗的结论可能更合乎实际。但是,法国种族主义者的宣传和法国警方的介入使得法国民众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改变其最初的和平共处的态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即已表现出对阿移民的厌恶,甚至因恐惧而疏远阿移民,使得阿移民不得不迁出市中心,建立自己的棚区。但此时的法国民众并未表现出任何极端的种族主义倾向,有些人甚至仍保持着对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蔑视。客观地说,法国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始终没有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

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深入发展,法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和法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以及由阿尔及利亚问题引发的法国政局的动荡,激发了法国民众的民族利己主义情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种族主义。麦克马斯特认为,促使法国民众的观念发生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三个:自阿尔及利亚归国的法国士兵的宣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独立运动”内部的血腥残杀,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开辟了第二战线。笔者认为,麦克马斯特对于法国民众观念转变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没有深入探究一下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因而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阿移民处境的恶化负有一定的责任,甚至负有主要的责任。因此笔者有必要指出,正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不肯放弃其在阿尔及利亚的种种殖民特权,才使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采取了开辟第二战线等法国民众所不愿接受的行动。

下面,笔者拟对麦克马斯特所提出的三条具体原因加以逐条分析和评论。其一,麦克马斯特认为,“当归国士兵的亲朋中有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负伤或死亡,他们就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敌人’表现出痛恨的情绪,并将殖民主义的观念和语言带入法国都市社会中”。笔者认为,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法国殖民军人至少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帮凶,他们的负伤和死亡应由推行殖民主义政治的法国政府来负责,而不应由阿尔及利亚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来承担责任。不过,麦克马斯特所说的也是事实,法国民众当时的确把责任强加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身上,这也正是法国民众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体现。其二,麦克马斯特认为,阿尔及利亚国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互相残杀行为使法国民众对“刽子手”表现出恐惧和愤恨,并将这种情绪迁移到阿移民身上。笔者认为,此项结论也是属实的,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斗争确实有些残酷。但法国民众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法国右翼报刊的恶意宣传,如《震旦报》等报刊极尽污蔑之能事,宣传阿移民及所有阿尔及利亚人的“残忍”和“野蛮”,其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所进行的暗杀活动都是有目标的,即法国殖民军以及那些主张向法国妥协的阿尔及利亚人,而很少暗杀普通平民。法国殖民军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据报道,1945 年 5 月阿拉伯人杀死了“103 个欧洲人……法国的报复非常野蛮。俯冲式轰炸机把 40 个村庄夷为平地……”根据法国官方的报道,一共有 1020—1300 名阿拉伯人被杀,阿拉伯人则声称有 4.5 万人(被杀)。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法国政坛“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口号喊得最响的法国共产党,也要求对“叛乱者”(指阿尔及利亚人)进行“迅速而无情的镇压”。同样的悲剧在 1955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p. 13 - 14.

年再次上演,法国军队又屠杀了 1273 名“反叛分子”。而且,法国“秘密军组织”的恐怖程度绝不亚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然而,对于法国军队在他国领土上滥杀无辜及“秘密军组织”在国内对阿移民的血腥屠杀,法国各界却保持沉默,甚至为其高唱颂歌。其三,麦克马斯特认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自 1958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以来,不时组织突击队袭击法国的军警人员和设施,其行为导致了法国民众对阿移民的恐惧和对立。笔者认为,阿尔及利亚在战争期间采用突击队的形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在战场上与法国殖民军抗衡。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从未与对方在战场上打过正规战争。麦克马斯特和法国民众强求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殖民者在战场上对阵完全是站在法国殖民者的立场上说话。而且法国殖民者首先在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上发动殖民战争,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回击也应是理解的。连麦克马斯特本人也注意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组织袭击时,尽量避免危及平民。但尽管如此,法国民众仍不能理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笔者对上述三条原因进行分析和评论,并非否认这些原因的存在和影响,而是旨在说明造成法国民众观念转变的关键性因素是法国民众的民族利己主义情绪。

然而,麦克马斯特并不孤立,持有类似看法的史家颇多。即使在当代,西方史家仍然将法国的种族主义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的种族主义之历史根源归结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暗杀活动,而极少有人将其与法国民众的民族利己主义及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西方史家的观点可以归结为:第一,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为“反叛”(rebellion)。笔者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持这一立场。在本文前引所有西文著作中都出现过“反叛”这一明显的殖民主义的词语。在二战后的法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是水乳交融的。第二,认为法国针对阿移民的种族主义行径和情绪缘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暗杀活动,而绝口不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民族解放事业的合理性及法国内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第三,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艰难处境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情绪。在这一点上,保罗·约翰逊与麦克马斯特的语调最为明显。第四,表现出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倾向,认为阿尔及利亚的前途只能是在接受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洗礼后才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就是“先进”对“野蛮”的洗礼,是“合理”而“正当”的。这是典型的文化种族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

法国民众中种族主义意识的增强在 1961 年“十月大屠杀”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法国民众对法国警察的屠杀行为的态度呈泾渭分明的两派,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通常需要极大的勇气,将受伤的阿移民救入出租车中,或向警察抗议、劝戒”,但绝大部分法国人却支

参见(英)保罗·约翰逊著,李建波等译:《现代——从 1919 年到 2000 年的世界》(下),第 608、612 页。

麦克马斯特关于法国民众对阿移民态度转变的具体分析,详见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p. 198 - 199.

从历史根源看,法国于 1830 年入侵阿尔及利亚,1834 年即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1871 年后索性将其划为法国的三个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在殖民主义者甚至是法国政府及所有的法国人看来,就是地方对中央的“反叛”,故而将这场本属于民族独立性质的战争定名为“叛乱”,英文表示为 rebellion。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时,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即明确说:“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是我们所保护的国家”;“对于叛乱不要期待我们的任何宽容和妥协……阿尔及利亚各省是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属于法国的。”(参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 84 页)

参见 Gordon, “French Aid to Africa: A Changing Agenda”; Alec G. Hargreaves,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France”; Martin Evans, “Franco - Alger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 - Cold War World”,载 Tony Chafer, *France,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New Order*, Macmillan Press, 1996, pp. 126 - 136, 207 - 218, 219 - 232.

Neil MacMaster, *Colonial Migrants and Racism, Algerians in France, 1900 - 1962*, p. 201.

持警察围捕、殴打阿移民,有的人坐笑旁观,有的人甚至帮助警察殴打阿移民。埃诺迪(Einaudi)认为,正是由于大批工人、商会甚至连社会主义团体都被蒙上了眼睛,才使得种族主义者得所欲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种族主义一旦在法国民众中扎下了根,就会比极端种族主义的危害更大、更难于拔除。

法国社会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普遍反思“十月大屠杀”和种族主义的罪恶。而在此之前,只有极少数左翼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学生和新闻记者)试图向人们揭露大屠杀的真相,但却显得与法国社会的主流声调格格不入。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当让·路易·佩尼乌(Jean-Louis Peniou)向人们介绍“十月大屠杀”时,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连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不相信他。甚至连阿尔及利亚战争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被法国社会所承认,法国社会仅将它作为一场“叛乱”或至多是“事件或困扰法国社会的难题”来看待。法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至今仍阴魂不散,但幸运的是,这一倾向正在减弱并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唾弃。

Abstract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Algerian immigra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Algerian War reached an extremity in French history.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e racists in the country adopted a sullyng propaganda, restriction on actions and even slaughtering policies to the Algerian immigrants. The French public changed from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the Algerian immigrants into a cold and detached attitude to the miserable situations of the Algerian immigrants, some of them even became accessories to the French racists during the “October Massacre”, only a very few of French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pulace were against the racialism and colonialis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Algerian immigrants in France declined and their life conditions were getting worse. These changes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lgerian war and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France.

(张庆海,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蔡曼华)

参见 J. - L. Einaudi, *Le Bataille de Paris*, p. 243。

参见 Tathar Ben Jelloun, *French Hospitality: Racism and North African Immigrants*, p. 51。

Robert Gildea, *France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8.